

黄楼一别月照再相逢

◎卜婧婷

彭城七里，文脉绵延千年，说起这里的山河风骨与人间风雅，总绕不开这一座黄楼和楼头的那一轮明月。

夏末秋初的彭城，夜里已有几分凉意。我和丈夫一同登上黄楼，晚风拂过飞檐。皓月高悬夜空，清辉漫过黄河故道，洒遍这一城山水。九百多年世事更迭，可今夜我仰望的月，与当年苏轼在彭城望见的，原是同一轮。月色，映照出苏子瞻在彭城的两载春秋，藏着他一腔赤诚与一场未尽的相逢。

子瞻，“瞻”本义就是举目远望。苏轼与彭城的缘分，就在这一重又一重的凝望里。

素白月色下的遇见
相逢之望

月色素净，照见了苏轼初来彭城时的意气与期许。

北宋熙宁十年，苏轼自密州启程，携弟弟苏辙一路泛舟泗水，奔赴彭城知州任上。他本钟爱山水，踏遍彭城各处。登快哉亭，叹“贤者之乐，快哉此风”；访云龙山水，赞“一色杏花三十里”。

我时常想，在密州写下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”和“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风”的苏轼，踏上彭城时是怎样一种心境。于苏轼而言，来到徐州应该算得上是一段安稳的际遇。“此生此夜不长好，明月明年何处看”，在彭城，苏轼与弟弟共度难得的团圆之夜。此时，距离乌台诗案只剩两年，风波尚在远方。大宋彭城街市熙攘，商铺林立，勾勒出鲜活热闹的市井画卷。千年流转，旧时市集的烟火不曾消散，如今藏在户部山的青砖古巷、回龙窝的老街之中。

这是一场温柔的相逢。彼时的子瞻，赋诗抒怀，心中风月坦荡。抬眼望向崭新的城池，这一望，是这段千古情缘的开篇，干净而明亮。

赤红月色下的坚守
一城守望

风云骤起，月色骤换，化作一轮炙热的红月，高悬洪水滔天的彭城上空。

平静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，黄河水奔涌而来，浊浪逼近城墙，满城百姓人心惶惶。有人劝他弃城避险，可苏轼却决意留下，与百姓共存亡。他束衣执杖，七十多个日夜风雨无阻，巡河堤、定对策。赤红的月光穿透风雨，落在他的身影上，也落在奋力护城的百姓肩头。这抹红，是为官者体恤苍生的赤诚，是彭城儿女守望相助的豪迈。

风雨终会平息。在苏轼与全城百姓坚守之下，洪水退去，万家灯火重新亮起。为镇固水患、铭记民功，苏轼取五行土克水之意主持修筑黄楼。一座黄楼屹立城头，成为彭城独有的精神印记。

风雨散尽，山河安澜。这时的苏子瞻，早已不只是赏景赋诗的过客。他扎根此地，目光牵挂城中百姓。月色无言，见证着他对彭城不离不弃的守望。

清碧月色下的重逢
千年回望

尘埃落定，黄楼之上尽是文人雅韵，也有着一别经年的眷恋。

水患平息，城池安然，彭城迎来了一段风雅的时光。黄楼落成，群贤毕至。秦观挥毫作《黄楼赋》，记彭城盛事；苏轼与友人把酒赋诗，月光融进一行行诗文中。

两年任期将尽，一纸调令，终要辞别彭城。碧月临水，却藏着无尽怅惘。他辞别手足亲人，辞别彭城百姓，辞别守护两载的一城山河。“天涯流落思无穷！既相逢，却匆匆。”一叶扁舟泛于泗水烟波，驶离彭城，消失在月色下的水雾深处。这一别，苏子瞻终其一生再未踏归彭城。

离开彭城后，苏轼辗转南北，宦海沉浮。无数月夜追忆彭城，频频回首望向这座城。世人皆叹，苏轼一别彭城，再无归期。可我始终相信：离别不是结束，而是一场漫长的重逢。

今夜我踏月登楼，向着千年前的身影举目瞻望。他的快哉之气与凛然风骨早已藏在黄楼的月色里，藏在快哉亭的清风里，藏在户部山的烟火里，藏在云龙山的松涛、云龙湖的波光里，藏在彭城七里生生不息的文脉风骨里。原来，我早已在云龙山的青石之上遇过他，在云龙湖的晚风之中遇过他，在黄楼的望月凭栏处遇过他，在苏公塔的斜阳光影里遇过他。

站在楼头，我向着千年前的他轻轻挥手。好像是一场梦，又绝非梦，我分明看到他也向千年后的彭城大地，向着这大地上的我们挥了挥衣袖。

我们与苏轼，苏轼与我们，终会重逢。

旧时王谢堂前燕

◎刘晓诗

“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

刘禹锡的《乌衣巷》写尽世家宅院的兴衰气韵。在徐州户部山，藏着一处媲美旧时王谢门第的古宅——崔家大院。这座户部山上历史最久、规模最大、规制最高的明清院落，携六百年风霜，以精巧绝伦的苏北建筑风骨，让昔日世家盛景，飞入了寻常百姓眼底，沉淀成独属于彭城的古建风华。

大院的文脉风骨，始于明代嘉靖年间。翰林崔海不满朝政昏暗，辞官归隐徐州，在南山结庐而居，比户部分司南迁尚早六十余载，为这片土地埋下诗礼世家的根基。崔氏一族科甲鼎盛，明清两代十三人登科入仕，书香传家、声名显赫。如今所见的崔家大院，为清代名士崔熹奉旨扩建，由上院、下院、客屋院三院相连而成，三百二十余间屋宇错落排布，半覆户部山西坡，层层叠叠的院落格局，尽显世家大族的恢弘气度。

崔家大院的美，藏在一砖一瓦的规制雕琢里，是徐州传统古建工艺的集大成之作。青砖墙肌理温润厚重，浅灰合瓦错落铺展，灰青相映、古朴素雅，简约间自带灵动气韵。而整座宅院的精髓，当属屋脊之上的极致装饰，层层脊饰分级有序、工艺考究，是古代门第地位最直观的彰显。

古建向来以脊饰定等级，民间最高规制便是“五脊六兽”。大院屋顶一正脊、四垂脊共五道屋脊，依次排布獬豸、天马、狻猊等瑞兽，形态逼真、静立檐端。古时礼制森严，脊兽的造型也大有讲究，“家有功名是张嘴兽，家无功名用闭嘴兽”，崔家檐前瑞兽尽数张口扬威，恰恰印证了家族世代科甲、仕途显赫的尊贵身份，为肃穆宅院平添几分威严正气。

在五脊六兽之上，更有着高阶珍品“插花云燕”，这是徐州古建独有的顶级营造技艺。不同于寻常插花兽的铁花点缀，崔家大院的插花云燕工艺更为繁复精巧，正脊瑞兽顶端，雕琢出纤巧灵动的兰草，搭配翩然欲飞的飞燕造型，辅以流云、日月、繁星等纹样交织缠绕。飞燕展翅、流云舒卷、兰草吐芳，动静相生、疏密有致。自古燕雀归堂便是吉兆，流云日月寓意岁岁安康，这些镌刻在屋脊的纹样，承载着崔氏家族对安居乐业、岁岁顺遂、诗书传家的美好期许，也藏着彭城百姓亘古不变的生活愿景。

除却屋脊盛景，院内雕饰尽显匠心。近百件木雕雀替、花板、驼峰、月梁错落分布，山花、勾檐、滴水之上，牡丹雍容、兰草清雅、菊花傲骨、鱼跃龙门灵动鲜活。一幅幅精美纹样栩栩如生，融山水、草木、祥瑞、励志于方寸之间，将徐州民间工艺的细腻雅致、诗书家族的品性风骨尽数呈现，整座大院宛如一本镌刻时光的线装古籍，步步皆景、页页含韵，耐人细细品读。

院中一绝，当属形制精巧的鸳鸯楼，是苏北山地古建因地制宜的典范。古时民居多为平房四合院，双层楼阁本就罕见，而鸳鸯楼依托户部山山坡落差而建，不设外置楼梯，南北两门相背、阴阳相生，上下两层各五开间，因阴阳相称、两两成对，取谐音“鸳鸯”，寓意阖家美满、世代和睦。

彼时户部山寸土寸金、宅基地珍稀，匠人匠心独运，以极致精巧的布局盘活空间，院落四门相合、开合有度，既最大化利用了山地空间，又契合四世同堂的儒家宗法。族人分屋而居、邻里相融、长幼有序，让传统家族的伦理秩序与团圆愿景，藏于建筑格局之中，兼具实用价值与人文底蕴，是中式古建“天人合一、以人为本”理念的生动诠释。

还有古朴庄重的谢恩坊，婉转清幽的雕花腰廊……崔家大院最大程度还原了古建原本的形制与神韵。一院一景皆匠心独运，置身其间，游人总能从一砖一瓦、一檐一饰间，触摸到古宅沉淀百年的温润风骨与世家气韵。

旧时王谢堂前，燕栖高堂、门第峥嵘；今日崔家大院，古建风华、文脉绵长。昔日世家深宅的恢弘气韵，不再囿于权贵望族，而是化作彭城大地的文化瑰宝，让千年楚汉风韵、徐州古建之美，岁岁流传，浸润于寻常烟火人间。

仁义徐州

◎韩亦可

沛县歌风台，台子不大，在平原上孤零零地立着。晨光把檐角染成赤色——那是“赤帝子”的颜色，也是《大风歌》最后一声叹息的颜色。这恐怕是刘邦在这片土地上唯一的纪念。一个开国皇帝，汉家天下的起点，整个民族姓氏的源头——在徐州，他只占了一座台。

还有萧何。大汉开国第一功臣，长安城的未央宫是他主持修建的，汉朝的法律制度是他起草的，连“汉”这个国号，也是他和张良一起商量出来的。他在徐州，几乎没有立锥之地，只在丰县老家有一处院子。

一个徐州人，走出了徐州，把一辈子献给了那个叫“汉”的天下，然后徐州人就把他忘了。不是故意的，是自然而然地忘了。因为他把自己活成了“汉朝的萧何”，而不是“徐州的萧何”。他走得太干净了，干净到故乡无从挽留。

而另一些人，徐州人给了他们最重的东西。

九里山在徐州北面，起伏绵延九里。山不算高，但走势雄壮。相传，韩信在这里设过十面埋伏，指挥了决定楚汉命运的一战。韩信不是徐州人，可徐州人给了他一座山，记住了他在九里山上排兵布阵的那个瞬间——那个瞬间里的军事才华，值得拥有一座山。徐州人分得清战争和人。你打赢了仗，从此天下太平，我就给你一座山。

子房山原名鸡鸣山。相传，张良在这里用一支箫吹散了十万楚军，徐州人把鸡鸣山的鸡赶走，把子房山给了张良。张良也不是徐州人，他祖籍在河南新郑。可他在这徐州的山上吹了一管箫，徐州人就记了两千年。那箫声里的智慧，那场不流血的胜利——比韩信的十面埋伏还要让徐州人着迷。杀人的本事固然大，可不杀人的本事才是真本事。山名一改，就是一份无声的契约：这座山，归子房了。

户部山在徐州城南，项羽曾在这里建戏马台阅兵。项羽不是徐州人，他和刘邦争天下，最后输了。可徐州人没有忘记他。戏马台至今还在户部山上。项羽站在台上。谁会都会想到——他穿着暗红色的战袍，银盔银甲，披风被风灌满，猎猎作响。徐州人记住的，是那个站在秋风里，披风被吹得满满的、八面威风的

摔进一座城

◎董广民

我整个人是从花坛上悬空摔到路上的。

那一刻的时间很短，短到来不及想任何事。只记得视线先是天空，然后是花坛的绿，再是扑面而来的水泥地面。眼镜飞了出去，额头撞上什么硬的东西，温热的液体瞬间漫过眉骨，渗进眼睛里，世界变成了模糊的红。胳膊火辣辣地疼，像是被粗糙的什么狠狠刮了一下。我趴在地上，愣了大约两秒，才意识到——我是头先着地的。

腿也疼。从膝盖往上，一阵钝痛。但我还是爬起来了。我甚至没有多看一眼那个花坛，没有骂一句“倒霉”，只是蹲下身，在满地碎渣子里摸到眼镜——镜片裂了，镜腿歪了——可我把它架回鼻梁上，歪歪斜斜地，跑向了公交车。

我要去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。今天是采风的日子，我知道这一去，头会继续疼，胳膊会继续渗血，腿可能会肿起来。但我心里只有一件事：必须去。哪怕摔得更重，采风不能缺。说不上什么豪言壮语，只是觉得如果今天不去，回头想起这个早晨，我一定会比摔伤更难受。人有时候就是这样，需要一点坚强，一点隐忍。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能扛，直到有一天，除了扛下去，你别无选择。

大客车晃晃悠悠地穿过彭城广场时，我已经用纸巾按住了额头的伤口。血止住了，但黏黏的，贴着头皮。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就在彭城广场下方，我沿着台阶走下去，冷气扑面而来，混着泥土和旧木头的气味。那是一种很深很沉的味道，像是从地底下翻出来的，带着时间的潮湿和重量。

然后我看见了那些遗址。千余平方米的明代街道、房基、铁匠铺、豆腐坊，还有砖砌的灶台。石板路两旁，藤篁筑成的防水堤坝保存得异常完整——那是徐州历代地下发掘中首次见到的洪水防御工事。明代的人，他们也怕水。水一来，城就淹了，房子塌了，人死了。可他们筑堤坝，盖房子，重新生火做饭。淹了再建，建了再淹，四百多次洪涝灾害，两千六百年的建城史，徐州就这样一层一层地把自己叠了起来——城下城、街下街、井下井。

我站在玻璃栈桥上，低头看着十二米深处那口汉代古井。陶制井壁光滑细腻，两千多年了，它还立在原

楚霸王。他那份烈性，徐州人自己身上也有。所以他们给了项羽一座山，全城最好的山。

云龙山在徐州城南，与户部山相邻。山上有放鹤亭、饮鹤泉，有苏轼的诗。苏轼不是徐州人，他是四川眉山人。他只在徐州做了两年知州，熙宁十年到元丰二年，不到两年。可就是这两年，每个徐州人都会记住他一辈子。他来的那年，黄河决口，洪水围城。他站在城墙上，下令“官吏分堵以守”，自己“庐于城上，过家不入”。几十天，直到洪水退去。走的时候，徐州人送了他很远。徐州人把云龙山给了苏轼，不是因为他官大，是因为他在洪水漫城的那个夜晚，没有走。

九里山、子房山、户部山、云龙山——四座山，给了四个外乡人。而开国皇帝刘邦，只在沛县占了一座台；开国功臣萧何，在徐州只有他自己家的一处宅子。

徐州人给刘邦一座台，不是亏待，是信任。信任他不需要山来证明自己——他的歌已经够大了，大到两千年后还有人在风里替他唱。而给那些外乡人山，是因为他们终究要走的，山是徐州替他们留的行李。韩信走了，张良走了，项羽走了，苏轼也走了。他们把最珍贵的东西留在了徐州。徐州就把最重的东西——一座山，压在他们留下的东西上面，好让它们不被风吹走。

萧何呢？他走了，连行李都不要。他只在丰县中阳里留下一处简陋的老宅子。只是他的名字已经化进了“咱们”这两个字里，化进了每一次自称“徐州人”时的底气里。

仁义的徐州，它不按照功绩的大小来分配记忆。功劳再大，大不过刘邦和萧何，可徐州人给他们的只有一座台，一处院。情义再深，深不过项羽，一个对手，徐州人却把全城最好的山给了他。思念再重，重不过苏轼，一个过客，只做了两年官的外乡人，徐州人用一座山来记住他。军再悲悯，悲悯不过一个用箫声化解了一场杀戮的人。徐州人心里有一杆秤，称的不是政治功过，是人心向背——你在这片土地上留过什么，徐州就还给你什么。

功过之外，另有尺度。胜负之外，尚有深情。这就是徐州的仁义。

地。我突然想起自己早晨那一摔。头着地，胳膊流血，腿也疼。可我还是来了。原来人在某些时刻，真的会爆发出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坚韧。摔倒了，爬起来，把歪斜的眼镜推一推，继续往前走——没有选项的时候，反而什么都不怕了。

也许冥冥之中真有某种安排——让我带着伤口走进这个满是伤口的地方。你看那些明代的地基，有的被洪水冲歪了，有的被泥沙半埋着，但它们的轮廓还在。灶台的烟道还是黑黢黢的，像昨天还有人在这里烧火做饭。铁匠铺的炉膛里还有炭渣，豆腐坊的石磨静默地蹲在那里，等着下一个早晨。他们在废墟间站了那么久，等的就是被人重新看见的一天。而我，带着破皮流血的胳膊，歪着眼镜，站在它们面前——这不算某种彼此成全？

我额头的伤口在冷气里一跳一跳地疼。胳膊上的划痕结了薄薄一层血痂。膝盖还是酸胀的，但我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站累的了。我在那些废墟间走了很久，看汉代的水井，看明代的堤坝，看陶钵上刻着的“彭城”二字——那是战国的灰坑里出土的，两个字工工整整，一千多年后被后人拓下来，做成了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的馆标。

古人刻下那两个字的时

博物馆的顶部是缓坡屋面，与彭城广场的地面顺接。从外面看，它像是广场被人掀起了一角，露出了下面的秘密。我从地下走回地面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偏西，彭城广场上人来人往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脚下踩着明代的街道、汉代的井。我的眼镜还是歪的，但我没有把它扶正——就让世界保持一点倾斜的角度吧，也许这样反而能看见更多。

头还在隐隐作痛，可采风完成了。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坚强，直到有一天除了坚强再无选择。今天我证实了这件事。而徐州，两千六百年来，每一层被淹的城都在证实同一件事——摔倒了就再建，掩埋了就再挖出来。这座城市和今天的我，都没有辜负这个早晨。